

土耳其复兴与中国抗战

钱湘声

前 言

土耳其与中国均位于东半球(Eaptern hemisphere),从前欧美人所讥笑之近东病夫与远东病夫,亦即指土耳其与中国而言,复兴前的土耳其民族是各帝国主义者虎视鹰瞵之目标,几酿成瓜分豆剖之局势,中国同样为各帝国主义侵略之对象,尤以日本帝国主义“大陆政策”的遂行,使中国遭受空前绝后之耻辱与损失,在今日:土耳其已经脱离帝国主义之束缚而独立,中国正为着世界仁义和平及民族生命存亡,与日本帝国主义决斗;中土两国之环境,虽不能同日而语,但颇多近似之点,故以土耳其之奋斗精神,作我抗战之借镜。

土耳其之兴衰

土耳其是回教宗主国,虽其土地不及我之广,人口不及我之众,物产不及我之丰,而地势之重要,较之我国亦不多让,土耳其地跨欧亚二大洲,与保加利亚、希腊、伊兰、苏联、叙利亚、伊拉克诸国为邻,北濒黑海,南滨地中海岸曲折交通称便,自鄂斯曼(Othman)建国以来,继而奥罕(Orklan)苏力曼(Salyman)之努力,势力伸至欧亚非三大洲,举凡小亚细亚阿拉伯高加索,以及东南欧洲非洲一部,无不入其版图,声势浩大,不可一世,犹之我国元代;及至十七世纪,嗣君不肖,百政失纲,官吏贪污,军人跋扈,加之各帝国主义之阴谋,于是国势凌替,领土日削。溯自一六八六年,俄皇彼得执政,厉行西进与南进两大政策,所谓西进政策之对象为瑞典,南进政策之对象为土耳其,其意义正与日本帝国主义之海洋政策与大陆政策相似。俄之西进政策因其气候不良,不易进展,于是取之南进政策,亦即决定土耳其之否运矣!时至一六九五年彼得亲率大军,开始侵略土耳其,纷纭扰攘,时达二百年之久,先后订立阿多威次条约(Taety of Ardowitz),布鲁斯条约(Treaty of Pruth)库恰克开拉齐条约(Treaty of Kutschuk-Kaimardjr)布加雷士特条约(Treaty of Bucharest),土耳其国土之损失綦重,政治军事外交商业宗教等,均受绝大影响,且俄罗斯之南进政策逐

步成功,志得意满,至于奥英等国家皆感不安,为其自身利害计,莫不逐鹿近东,而土耳其所感之威胁亦甚矣!

土耳其之第一次革命

土耳其之全盛时期,在十六世纪初叶及至十六世纪中叶以后,国威渐替,失土丧师,尤以十九世纪为甚,后经各帝国主义之扰骚,土耳其几无统治能力,是以土耳其所属各小民族,纷纷脱离关系,先后独立自主;至于土皇亚伯都□□得第二(Abdul Hamid II)执政,专制谬妄,变本加厉,创有所谓侦探制度(system of Ispionage),从事铲除异己,人民尤不堪命,且当时各列强均加紧经济上以及文化上之侵略,此时土耳其之地位,何啻为次殖民地,国内有志之士,思有以挽救危亡,于是发起青年土耳其党(Young Turk Party)之组织,以安佛而(Enver)为领袖,于一九〇八年正式宣告革命,其主要政纲在成立议会制之宪法,将土耳其造成个君主立宪之现代化国家,经过一九〇八年七月及一九〇九年四月两次奋斗,青年党完全握得政权,为其统一内部起见,鼓吹所谓泛回教主义与土耳其主义(Pan-Gslamism Pnd pan-Jurkism)推行宪政,充实军备,改进外交,国势日有起色;詎料一九一四年欧洲大战爆发,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发生土耳其保护法舰事件,经协约国反对,后竟对土耳其宣战,土耳其遂卷入欧战漩涡,自参战后,虽有胜负,惟因大战整个大局不利,加之同盟国布加利亚首先屈服,于是土耳其与德奥之交通完全中断,军需匮乏,政府无作战到底之决心,而乞和停战,与协约国订立马得洛休战条约(The Armistice of madres)以及绥弗而和约(Treaty of Sovroo),此种形同亡国之条约,其苛刻程度仿佛于日本对我提出之二十一条,元气大伤,所有青年土耳其党之努力,亦功亏一篑。

土耳其之复兴

土耳其在千钧一发之际,有莫斯达华凯末尔(Muscstapha Kemal Pasha)所领导之土耳其国民党之产生,以小亚细亚为根据地,以练兵与训民为其重要工作。凯末尔素为土耳其人民所崇拜,故来归者甚众,经数次之全体大会,组织异常严密,工作效力亦大,于是声势日张,并于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八日创行国民公约(National Pact),此公约于土耳其复兴史上占最重要之一页,内容虽仅六条,而意义及其深切广泛,土耳其国民党自宣布国民公约以后,各帝国主义均出面干涉,勒令君士坦丁堡政府土皇严惩国民党,而土皇昏庸无能,竟惟帝国主义者之马首是瞻,严禁国民党行为,逮捕国民党党员,于是国民党毅然否认君士坦丁堡政府,而成立新政府于安哥拉,数次对外宣言,所有土皇订立任何丧权辱国条约,土耳其人民一律断然否认,一九二一年一月三十日凯末尔正式对国内外宣言,以安哥拉之国民会议政府,为土耳其之唯一政府。新政府在外交军事两方面均有圆满之成绩。

故国家渐上复兴之道。土耳其复兴途中之最大障碍,即为三年来之希土战争,希腊自一八二一年离土耳其独立,国势日盛,乃进一步鼓吹大希腊主义,力图国土之推广,复得英国海军之援助,于是进攻土耳其之安勒托里亚,土军节节后退,迭失名城,凯末尔将军乃亲临前线,指挥若定,土耳其口前所失之土地,次第收回,希军全部溃退。于是在一九二二年九月订立马丹尼亚休战协定(The Armistice of Mudania),并由各列强主持调停,开会于瑞士之洛桑,会议席上经土耳其代表伊士美伯沙(Ismet Pasha)以战胜国家之尊严,宣称“土耳其当与列强处于同等之地位,并要求各国军队一律退出土耳其国境,及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”,各协约国均一致同意,即于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正式签字,从此土耳其脱离帝国主义之束缚,向复兴道上迈进矣!

中国之革命运动

任何革命之产生,均非偶然,必有其时代背景;即如上述之土耳其革命,内则由于君士坦丁堡政府之昏庸无能,外则由于各帝国主义之压迫,中国革命之原因亦然,国内政治不上轨道,国外帝国主义者之侵略日亟,是以国民革命遂以救国为目标而兴起。溯自孙总理倡导革命,数十年之奔走,经多少忠勇党员之奋斗流血,始推翻专制,建立共和,惟军阀势力仍潜伏国内,革命尚未成功,总理已与世长辞,幸有委座领导同志,继续努力,誓师北伐,所向无敌,数年间即肃清余孽,统一全国,“推翻专制,消灭军阀”之使命予以完成;此所谓国民革命第一期革命是也。至于第二期革命则为对外完成中华民族之解放,中华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,我领袖曾昭示国人:所谓“和平未至完全绝望,决不放弃和平,牺牲未至最后关头,决不轻言牺牲”,故在可能范围以内,决不以武力为解决国际问题之手段,惟日本帝国主义者之目的在颠覆我国家,消灭我民族,故我虽忍辱食垢,冀其反省;乃敌阀得寸进尺,变本加厉,于前年七月七日造成卢沟桥事变。我无可再忍,为保障民族生存,完成革命任务,于是全面抗战序幕开矣!

中国在抗战中

自“七七”事变,“八一三”之中日战争接踵而起,倭寇逞其精良之武器,侵略我国,其残酷为历史上所仅有。然我全国军民,在蒋委员长,统一指挥之下,空前团结,贡献其人力财力与物力于抗战建国,其坚苦卓绝,大非敌人始料之所及。其速战速决之预期既告失败,妥协和解之企图又复不遂,苦闷焦躁,可以想见,崩溃之期,当不在远。虽然,现阶段吾人对于所应有之努力,未可忽也。土耳其之所以获得最后之胜利,以其内则万众一心,拥护最高领袖凯末尔将军,全力以应付国难;外则于御侮抗战之际,同时折冲樽俎,争取与国,扩大外援。吾人今日亦应效法于斯,加强团结,服从蒋委员长之指挥,本“军事第一,胜

利第一;”“国家至上,民族至上;”“意志集中,力量集中”之共同目标,百折不回,再接再厉,以精神胜物质,以时间易空间,最后胜利必属于我!

结 论

在今日“生存竞争,适者生存”原则之下,惟其“牺牲”,才适于竞争之潮流,惟其“奋斗”,则能达生存之大道,不牺牲不奋斗,犹今之奥大利捷克斯拉夫然;能牺牲能奋斗,则如今之土耳其是;故生存与否,系乎牺牲奋斗精神之有无耳;大凡世间易作之事,无须奋斗,更无牺牲可言,所以牺牲奋斗之精神,须贯彻事业艰难之中,艰难至何种程度,则奋斗至何种程度,牺牲至何种地步,我最高领袖曾经昭示国人:“我们要知道这一次抗战,是死中求生的一战,必须经过非常的危险与艰难,才能达到最后之胜利……我们认定这次抗战,断不是短期内可了的事,要预先想到今后的困难和艰苦只有一天一天的加重,因此必须准备着一切来应付以后的牺牲和困苦,来担当比现在的困苦艰难几十倍还不止,我们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,才能达到民族生存的目的……”。所谓“经过非常危险与艰难”,亦即经过非常牺牲与奋斗,“困难和艰苦是一天一天的加重”,亦即牺牲与奋斗一天一天加重,具有牺牲与奋斗之精神,必能达到“抗战必胜”之目的。土耳其之复兴,即吾人之良鉴也。

最后愿以二语与国人共勉:

屈服即失败!

奋斗即胜利!

二十八年四月写于重庆

摘自《回民言论》(重庆版) 1939年 第1卷 第9期 第19-21页